■ 大众时评

“分数成功”不等于“教育成功”

□ 余 萍

据近日《法制晚报》报道，北京大学数学系一名刚刚入学3个星期的大一新生日前在宿舍中上吊，仍处于最危险的抢救期。

近年来，大学生自杀事件屡屡发生，究其原因，无非是承受不了生活、学习、感情的压力。那么，解除这些压力就可以避免自杀事件的发生了吗？非也。自杀事件，直接拷问的是教育。

我们的教育到底怎么了？提起教育，人们第一反应就是想到学校，想到教师。一遇到问题，也会自然地将一切归咎与学校和教师。谁都知道，学校教育仅仅是一方面。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也一样亟待被重视。

就北大学生上吊事件本身，从目前媒体的报道看，似乎是因为学习的压力。但是，我不禁要问：谁的人生一帆风顺？谁不遭遇些困难与挫折？难道遇到困难就去死吗？无疑，这位大学生是懦弱而自私的。他不敢面对挫折，也不考虑自杀行为会给家庭、社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是什么造就了他懦弱自私的本性？是教育的缺失！

首先，家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孩子考取北大，谁都觉得这样的教育是成功的。但我只能说，这是分数的成功。对一个孩子教育的成功，要看孩子的综合素养。无疑，这位自杀学生严重缺乏面对挫折的勇气与信心。现在的孩子，从小到大都在呵护中成长，只能享受阳光不能接受风雨，只能享受表扬不能接受批评。这如何能适应社会？要培养孩子健全的人格，平时家长切不可一味地溺爱孩子，迁就孩子，而是要培养孩子正确认识自己，勇敢面对困难，学会主动解决问题。

其次，学校教育中人性教育的缺失。教育改革一浪高过一浪，但每一浪都以分数为准则，以升学率为生命线。学校教育以成绩为核心，孩子从小被密封在题海里拔不出来，哪里还能接受到关乎人性的教育？就像这位北大孩子，一路走来一定都是鲜花与掌声，走进大学突然发现自己适应不了，于是选择了自杀。所以，学校教育，在关注分数的同时，应多关注孩子的内心世界，多关心孩子的心理健康，不要让分数压抑孩子的个性，压扁孩子健全的人格。

那么，我们的社会教育呢？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过：“到处是生活，即到处是教育；整个社会是生活的场所，亦是教育之场所。”正所谓‘社会即学校’。”但社会是多元的，有善良也有丑陋，有阳光也有阴影。孩子毕竟是孩子，明辨是非的能力弱，往往会受到社会上很多负面的影响。我国正处在快速发展的社会转型时期，各种观念、思潮层出不穷，交叉碰撞。不同的社会舆论导致社会对未成年人的评价莫衷一是，这也会导致孩子偏离正确的人生观。

在日本，每年1月的第2个星期一，凡满20岁的男女青年要身穿传统服装参加官方或者民间团体为他们举办的成人仪式。内容包括年轻人宣誓长辈的祝福等。成人仪式的精髓，在于使青年开始懂得“成人之义”，所谓“弃尔幼志，顺尔成德”，提示孩子从此担负起家庭、社会、民族的责任，提示孩子已正式跨入社会，获得全新的人生角色。这类似我国古代的冠礼吧，现在呢？我们这一块教育很缺乏。

因此，北大新生的自杀事件，是教育的失败，家庭、学校乃至整个社会应该一起“埋单”并反思。

■ 网 声

打车难 需标本兼治

打车原本是较为便捷的出行方式，然而近年来，打车难却一直困扰着许多市民特别是上班族。如果仅靠行政手段强求、威慑并不能根治打车难顽疾，解决打车难必须标本兼治。既要改善出租车运营的管理，又要完善城市配套功能。出租车从根本上来讲是一项公共服务，这就需要政府、市场双管齐下，推动出租车运营模式的改革。要完善出租车管理中的激励机制、监督机制，激发、调动出租车司机的工作热情，规范他们的运营行为。

警惕高速之下的质量隐患

在建设数量不少、建设工期不长、企业利润不高的背景下，保障房建设的全面提速，难免让人担心：速度上来了，质量会不会下去了？质量的衡量和监管，在一定程度上远要比进度管理来得复杂和艰难，需要坚定的决心，也需要细致的工作。这就需要严格检查，切实监管，不搞形式主义，不走过场。通过检查，堵住安全漏洞，消除隐患，避免出了问题事后追责的被动局面。

对小作坊保持常态化监管

买进劣质肉，用香精提味掩盖，媒体对北京个别包子铺的调查触目惊心。除非从头到尾都寸步不离地监管，这些食品小作坊要想添这加那简直是易如反掌。执法者可以用暗访抽查的办法，保持一种常态化的市场监管。同时对那些百姓的日常饮食，执法者可以用平民的身份购买进行抽检化验，保持一种动态的食品安全监测。对抽查的问题食品予以严惩，如此必能震慑来者。让百姓信任，靠小作坊自己，更靠政府监管部门的严格约束。

安全气囊无国标谁保安全

目前我国的安全气囊并没有国家标准，各汽车厂家使用的安全气囊，其标准都是由厂家自己制定。汽车越来越多地走进寻常百姓家，无国标谁来保证安全？一旦发生纠纷，谁又能捍卫合法权益？安全气囊，为何迟迟没有一个“国标”？汽车的专业性特点让消费者在维权过程中本就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如果再缺乏强制性的国家标准，消费者要想和汽车厂商维权比登天还难，安全气囊无国标局面不能再延续了。

（大众网 王晓亮 辑）

火车票退票费下调 是对民意的尊重

□ 蒋光平

铁道部发布消息，自9月25日起，旅客火车票退票费标准下调，火车票退票费按照车票面额的5%收取。同时，将于9月底前全国动车组分步实行互联网售票。**（近日《京华时报》）**

铁道部这次对火车票退票费的下调，意味着实施了14年的“霸王条款”终于向民意低了一次头。1997年12月1日起，铁路客运运价规则实行，火车票退票费按照每张车票面额计算，收费标准按每10元（不足10元按10元计算）核收，按车票面额每10元收取2元退票费，2元以下的票价不退。铁道部推行退票费标准屡遭质疑，被公众斥为“霸王条款”。2006年1月1日起，铁道部对火车票退票费进行修改，改为按每张车票面额计算，收费标准为20%（四舍五入到元）。这一调整让不少网友认为“隔靴搔痒”。

一直以来，铁道部的一些“霸王条款”常常为民众所诟病，有关退票费的标准也一直遭到人们的质疑。奈何火车晚点铁道部不对旅客给予赔偿，而一旦旅客晚点退票就要承担20%的高额退票费？铁路部门服务的准则就是让人民群众满意，满足旅客的各方面需求。一直以来，降低火车票退票费的呼声很高，铁道部这次下调退票费，将收费标准从票面价格的20%收取调整为按5%收取，这实际上是对民意的尊重。

另外，笔者认为，我们在看到铁道部尊重民意的可喜变化的同时，也要意识到火车票退票费的下调可能导致一些“黄牛党”乘机囤票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因为退票费下降的同时也减少了“黄牛党”的损失，如果春运期间更多的车票被票贩子囤积，导致春节期间一票难求的问题更加凸显。这就需要我们的铁道部门进一步加强对“黄牛党”的打击力度，不要让一些不法分子钻了铁道部“惠民政策”的空子。

铁道部下调火车票退票费，是一次对民意的尊重，也是改变自身形象的有益尝试，愿以后铁道部能多从民意的角度制定政策，让更多的旅客获得实惠。

■ 画里有话

让留守儿童分享公共服务的阳光

□ 雷泓霈

如今，农村留守儿童越来越成为一大社会问题。

为什么会有留守儿童？因为他们的父母背井离乡去了城市。据报道，如果没有农民工，超过一半的饭店要关门，近七成的生产厂家要关门、近八成的大楼盖不起来。他们对GDP的贡献率达到了16%；农民工进城减少了政府、城市在培训和教育方面的开支；农民工有将近一半的收入会在城市生活中消费掉。

农业问题专家温铁军作过统计，如果按农民工平均每人一年提供两万元的产值计算，一亿进城农民工就为国家奉献了两亿元。可以说，城市的繁荣发展，离不开留守儿童父母们的贡献。

但留守儿童的受教育现状却让人担忧。上最差的学校，缺乏父母的关爱，导致留守儿童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中国儿童早期发展与教育》报告提出：要把0到6岁儿童早期发展纳入政府扶贫计划和公共服务框架，以打破极端贫困家庭的代际传递。但事实上，对留守儿童的教育，我们欠账很多。

农村留守儿童普遍存在“早教”短版。早教和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一样重要，也是教育的重要构成，应该引起重视。对农村留守儿童智力开发得科学、及时，就能得到事半功倍的教育效果，让孩子得到快乐，也得到潜能挖掘和人格养成；否则，就会遗患众多。

目前，农村缺乏幼儿园，留守儿童娱乐活动单调成为一大问题。要认识到，“玩”也是一门大学问，“玩”对于孩子的智力开发、潜能开发以及性情培养都是一种有益推动。正如专家所言，“儿童早期是人生发展的关键期，其身体、心理、情感、语言行为和社会能力等处于综合协调发展阶段，生活经历和体验对智力、性格及社会行为形成有重大影响，可影响其一生的健康幸福”。

整体而言，政府应考虑让留守儿童发展成为政府日常服务对象，不能因为儿童年龄小、身份卑微、话语权弱化，而淡忘对他们的关心，通过财政支持、政策扶植、用地安排、教育优惠等政府行为，加大儿童公共设施的建设和早教机构的完善，尊重儿童的发展需要和权益需要，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增强服务意识，促进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漫画/李晓宜

从招商引资到招商选资

泰安高新区非大、高、新项目莫入

□记者 姜言明
通讯员 石振房 董梅 报道

本报泰安讯 9月18日，蒙牛乳业泰安有限责任公司二期低温奶项目在泰安高新区竣工投产。据悉，该项目总投资2.6亿元，是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山东地区建设的唯一低温奶生产基地。目前配有生产线10条，全部达产后可实现年产量9万吨，营业收入6.5亿元，成为蒙牛集团总部之外最大的综合性生产基地。

无独有偶，7月7日，投资1.5亿元的三一重工集团“工程机械整机及零部件再制造和生产项目”落户高新区。从获得信息到邀请客商前来考察、洽谈，到分析论证、专家咨询，到项目正式签约，前后不过一个月时间。目前，各种开工手续正紧张办量中，预计下个月项目将开工建设。

与上述项目命运不同，一个投资几个亿的高能耗项目，看中了高新区的区位优势，今年多次派人前来洽谈，但其能耗标准与进区标准相距甚远，最终被拒之门外。据统计，今年上半年，高新区新签“大、高、新”项目15个。与去年全年新签约、落地42个项目相比，数量不算多。区招商局副局长张新认为：“这是从量到质的变化，体现的是科学发展的理念。”

在2009年制定“大、高、新”工业项目进区新标准和条件基础上，今年4月，高新区再次提高了进区项目的“门槛”，那就是“四新一海”：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新材料产业、新医药和生物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海洋开发及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强度从原先的每亩180万元提高到200万元以上，高新项目投资总额也从一亿元以下提高到一亿元以上。

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刘卫东表示：“今后，我们将按照对现实与未来高度负责的原则，尽快实现由‘招商引资’向‘招商选资’的转变，高新区非大项目、高新技术项目莫入，既要重视经济效益，更要重视环境保护等。同时，更加注重单位面积投资强度和产出效益，重视高科技项目及为生产服务的现代服务业项目，增加地方财政收入，服务民生。”

与此同时，在高科技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中，高新区重视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逐步建立了以国家级高创中心为龙头，以泰山科技城、星火科技园为梯次孵化基地，以中小科技型企业产业聚集带为依托的“一体两翼三级孵化”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到去年底，在孵企业达到107家。

截至目前，高新区认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21家，占全市高新技术企业总数近一半，成为转方式调结构的主要力量。“十一五”期间，全区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年均增幅47.7%，去年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61.66%。今年上半年，高新区规模工业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80.2亿元、利税7.2亿元、利润4.4亿元，分别增长24%、31%和35%以上。

□贾鹏 报道

9月13日，来自北京的游客在乐陵市“百枣园”里采摘金丝小枣。今年，该市与中国林科院联合兴建的“百枣园”正式开园接纳游客。该枣园占地100亩，汇集无核枣、龙枣、磨盘枣、茶壶枣等国内知名枣树品种273种，成为一处集引种试验、物种保存、游览观赏为一体的科普乐园。

邹平建立 三级环卫管理网络

□厚忠 晨光 福录 报道

本报邹平讯 9月，秋高气爽。走进邹平县好生镇小高村，平整的水泥街道两旁绿树成荫，整洁舒畅。村支书左克民说：“今年村里花10万元，完成了地面硬化、绿化，清理了旮旯胡同，村民日常生活垃圾都放在垃圾箱里，每天早晨由镇环卫队统一清运。

去年以来，邹平县制订统一方案，对全县16个乡镇、街道办进行农村生态环境的综合治理。目前，已新建垃圾中转站25个，首批配套清运机械26辆、地埋式垃圾箱265个，全部投入使用，初步建立了“村收集、镇清运、县处理”的三级管理网络。目前，日处理生活垃圾能力400吨、生活垃圾处理厂服务范围已经扩大到3个街道办和全县13个镇。此外，该县还建立了日处理污水能力6万吨的大型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厂的服务范围覆盖200个行政村，并与县城水管网连接，农村污水和城市污水在这里汇流，净化后用于灌溉和淡水养殖。

兰山3万亩农产品 搭上“农超对接”快车

□洪涛 颜超 高倩 报道

本报临沂讯 9月14日凌晨，兰山区半程镇程荣蔬菜种植基地一片忙碌景象，菜农在各家大棚里忙着采摘蔬菜，分拣装车，运往城里的各大超市和批发市场。

依托中心区优势，兰山把“农超对接”作为农产品基地品牌建设的重要环节，推动优质农产品基地、合作社与超市、农贸市场对接，实现从菜园子到菜篮子的一步跨越。工作中，该区加强生产监管，组织农技专家开展技术服务，制定标准化生产技术规程，建设农药残留检测室，建立检测制度，每批农产品农药残留检测合格后才能供应超市。

目前，兰山区有全乐、清春、兰旗等9家合作社，3万亩优质农产品基地，分别与市区超市以及华丰、华东等农贸市场实现了“农超对接”，每天供应新鲜蔬菜、水果近1.6万公斤，促进种植户人均增收8000余元。

安丘一农民企业家 捐200多万元助学

□学宝 京富 田杰 报道

本报安丘讯 安丘市凌河镇凌河村农民企业家孙业润近日捐资20万元，用于当地一所小学的配套设施建设。20多年来，他致富不忘家乡教育事业，捐资助学资金累计已达200多万元。

孙业润1983年从部队转业后，进入村办的汽车大修厂当工人。后来，他先后经营过木器厂、保温材料厂、酒店等企业，现在是潍坊东海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有了一定积蓄后，他仍然过着俭朴的生活，但对捐资助学却非常慷慨，先后资助12位贫困中小学生直至大学毕业。每年教师节，他都要到镇里的中小学和中心幼儿园走访慰问。

今年秋季，当地拥翠小学的师生搬进了崭新的教学楼，可是设施却不配套，桌椅板凳陈旧。孙业润得知后，立即捐资20万元，将学生课桌、板凳和老师的办公桌椅全部更换成新的。

谁种的棉花好我给谁发奖

王建军自办棉花生产观摩会

□任增亮 刘丹丹 王景波 报道

本报滨州讯 “现在我宣布：滨城区2011年的植棉冠军是张鲁滨。”8月20日，由滨城区秦皇台乡王家村种棉大户王建军投资举办的第五届棉花生产观摩会上，来自滨北办事处大连张村的植棉大户张鲁滨夺得冠军，王建军为他颁发了价值1200元的奖品。这是王建军连续举办的第五届棉花生产观摩会。

今年40岁的王建军是秦皇台乡王家村农民，经过长期实践学得一手棉花管理技术。他种植的棉花连续多年亩产都在700斤左右，年收入近10万元，比其他棉农的棉花亩产高出250多斤。看到王建军的棉花长得好，许多棉农都慕名前来请教，接待工作一度占了王建军很大一部分精力。为了方便与棉农进行交流，2006年8月，王建军在自家棉地里举办了第一届棉花生产观摩会，让来自惠民、东营、高青等地的200余名棉农一块来地里交流技术，交流种棉经验。他们从选择良种、化肥、农药，一直谈到棉花行距、株距和修剪等，双方都受益颇多。“通过交流，我跟惠民的棉农学会了瓜棉套种技术，跟寿光的飞扬合作社的技术员学会了育苗、种植果树”，王建军说，“从那时起，我就想把观摩会一直办下去。”

2008年至2010年，王建军又连续在自家的棉田里举办了三届棉花生产观摩会，参加的人数由最初的200多人发展到500多人，涉及东营、济南、滨州、淄博等七个市。为了更好地与广大棉农进行交流，王建军在乡政府帮助下成立了滨城区农喜棉花专业合作社，专门为棉农提供种子、肥料、技术指导、棉花销售等服务，并建立了山东农喜棉花网和棉农QQ群，时常与棉农在网上进行交流。

“通过举办棉花生产观摩会，我们乡的50个村的棉农都对科学种棉有了新认识。为鼓励棉农学技术，今年我们在滨北办事处的框王村举办了第五届棉花生产观摩会”，王建军说，“今年我个人拿出了6000元，评选‘植棉状元’，报名参赛的17名选手都在自家的棉田里带一株棉花来，现场的人都是评委，谁的棉桃大而多就是状元。”

经过现场评选，张鲁滨、杜玉波、王会岭分别以87个、67个、53个单株棉桃数夺得一、二、三名，分别得到了价值1200元、800元和400元的农资，其他选手获得了参与奖。

潍城老人老有所乐

□国胜 伟利 炳山 报道

本报潍坊讯 “在这里练练书法，可以相互点评，练得起劲啊。”9月13日上午，家住潍坊市潍城区安顺社区74岁的老人陈吉训在社区老年会所对记者说。

目前，潍城区60岁以上人口达5.78万人。面对老龄化形势，针对民生需要，潍城区今年启动了老年会所建设。老年会所为老人提供了活动场所，丰富了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和谐了邻里关系。据悉，潍城目前已在27个社区建起老年会所。到年底，全区42个城市社区、8个农村社区都将建起老年会所；另外，区里还将建设一处2700平方米的高标准示范性老年会所。